

编者按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多元一体,生生不息,是中华民族和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宝贵遗产和重要精神财富。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为北疆文化提供了传承发展的土壤,北疆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内蒙古的生动体现。在乌兰察布大地上,留存的珍贵文物如同开启往昔岁月大门的钥匙,让我们得以见证这片土地上的变迁。

近日,记者走进乌兰察布市博物馆,近距离参观诸多历史遗存,领略历史文物的魅力。

乌兰察布盟长印:穿越历史的权力象征

□本报记者 王丽宏

在乌兰察布市博物馆的众多珍藏中,有一件文物格外引人注目,它就是银质虎钮方形的乌兰察布盟长印。这枚印章不仅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更是研究清代早期政治、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价值,堪称乌兰察布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乌兰察布盟长印于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由清廷礼部铸造颁发,历经二百七十余年仍保存完好,彰显清代官印的庄重气质,属国家一级文物。”走进乌兰察布市博物馆第三展厅,讲解员邢婉筠正在向参观的市民介绍这枚印章。据了解,乌兰察布盟长印边长10.5厘米,高9.5厘米,厚2.6厘米,重3.9千克,印面为方形,上方铸有生动威严的虎形钮,宛如一只准备奔跑的猛虎,栩栩如生。来自河北的游客徐正凯疑惑地问:“为什么会选用虎作为印的形象呢?”

博物馆讲解员耐心解答道:“虎的形象既符合《周礼》‘以虎节镇四方’的礼制传统,又象征盟长统摄军事的权柄。这枚乌兰察布盟长印工艺精湛,细节纤毫毕现,充分体现出乾隆时期官印铸造的巅峰水准。”

乌兰察布盟长印的印面刻字也蕴含着丰富的信息,前部阴刻“礼部造”三个字,明确了印章的制作机构;后侧阴刻三行满文,翻译为汉文亦是“礼部造”;左侧阴刻“乾隆拾叁年肆月”,记录了印章的铸造时间;右侧阴刻“乌兰察布盟长印乾字壹佰拾陆号”,是这枚印章独一无二的编号。

印面采用蒙满两种文字阳刻,左侧蒙古文两行八字,右侧满文两行六字,意思都为:乌兰察布盟长之印,遵循《大清会典》“中央颁铸的内外蒙古部落盟长、札萨克印、虎钮银印,右满文,左蒙文”的规定,体现清廷的边疆策略。

为了深入了解这枚珍贵印章背后更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记者特别采访了乌兰察布市博物馆副馆长张涛。

当问及这枚印章的工艺特色时,张涛眼中闪烁着光芒,兴致勃勃地介绍道:“乌兰察布盟长印的制作工艺堪称一绝。以虎钮为例,其雕刻工艺的精湛程度令人赞叹。阴刻纹饰与浮雕法的运用,不仅生动地展现了老虎的外形特征,更将老虎的神韵与气势完美呈现。这种工艺在当时需要极高的技艺水平,反映出清代工匠们卓越的艺术创造力。印文的雕刻也十分讲究,蒙满两种文字阳刻得清晰规整,体现了当时官方印章制作的严谨性与规范性。”

谈及印章的历史价值,张涛神情严肃,娓娓道来:“清朝在蒙古地区推行盟旗制度,乌兰察布盟长印是这一制度下权力的重要象征。它见证了清朝对边疆地区治理体系的构建与完善。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枚印章是研究清代边疆政治史的关键实物。通过它,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央政权如何通过制度设计与权力授予,实现对蒙古地区的有效管辖,对于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清代的巩固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清朝在蒙古地区推行盟旗制度。盟是建立于旗之上,对各族进行协调和监督的机构。盟长人选从所属各旗旗长中产生,而这枚乌兰察布盟长印便是盟长权力的象征。清廷通过礼部制作并颁发此印,赋予乌兰察布盟长管理地方事务的权力,同时也体现了清政府对地方势力的统治政策,是中央政权对边疆地区有效管辖的重要物证。它见证了清代乌兰察布盟的政治格局,反映了当时蒙古地区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紧密联系。透过这枚印章,我们仿佛感受到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

乌兰察布盟长印以其独特的造型、精美的工艺以及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在众多文物中脱颖而出。它不仅是乌兰察布地区历史发展的见证者,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实物例证,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让更多人了解它背后所承载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 乌兰察布盟长印



虎衔鹰金饰牌:精美工艺与文化交融的见证

□实习记者 杨佳

乌兰察布市博物馆第二展厅内,一对金光熠熠的饰牌格外引人注目,饰牌上的图案形神兼备,栩栩如生。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两件饰牌叫虎衔鹰金饰牌,因其图案和材质而得名,是世界上已发现的最大金饰牌。它们出土于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前旗黄旗海镇白家湾村,不论是工艺还是寓意级别都非常高,是乌兰察布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乌兰察布市博物馆讲解员付迪说。

白家湾出土的虎衔鹰金饰牌、兽咬马金饰牌的题材,在鄂尔多斯、乌兰察布市凉城县、俄罗斯斯基泰文化中均有发现。与其他地区出土的文物不同的是,白家湾虎衔鹰金饰牌更加写实,篆刻更精细,装饰性更强。

经考古专家鉴定,虎衔鹰金饰牌的年代可追溯至战国晚期(约公元前2世纪),距今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两件饰牌均以纯金打造,尺寸相同,长15厘米、宽10.1厘米,厚度仅0.1-0.2厘米。但重量惊人,分别达553.45克和431.24克。经检测,其黄金纯度高达996%,几乎接近纯金,足见其珍

贵程度。

据史料记载,汉初匈奴的漠南王庭势力范围涵盖乌兰察布地区,专家推断,如此奢华的金饰牌极可能是匈奴漠南王的有关物件,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饰牌以猛虎衔鹰为主题,刻画了一幅极具张力的狩猎场景:猛虎呈三足站立姿态,獠牙毕露,虎口紧咬鹰头,右前爪牢牢扣住鹰的颈部,展现出强大的力量感。虎身刻画精细——立耳、鬃尾整齐、尾巴后翘,尾巴尖甚至打绕成卷,栩栩如生。虎的颈部有项圈,由叶片纹和圆点组成,肩部和臀部装饰有叶片纹、圆点纹及三叶草纹。

关于这些纹饰,讲解员付迪介绍,饰牌正面为浮雕状,两饰左右对称,纹饰相同。金饰牌上的双层绳纹装饰和叶状纹都属于西汉时期流行的纹饰。表面的凹槽部分曾镶嵌有绿松石,经过岁月的洗礼,大部分宝石都已脱落,但仍能窥见当年的华美。

虎衔鹰金饰牌的铸造工艺极为考究,采用了双合范嵌活块芯工艺,该技术源自商周时期的青铜铸造法。如今,饰牌背面仍可见清晰的范

线和金属飞边,桥形钮也是在铸造时预留的。从饰物正面纹饰的形态及线条之间的打破和叠压关系可见,金属坯体成型后,工匠再采用篆刻技法深化细节。纹饰线条层次分明,清晰地反映了不同环节的雕刻工艺。

值得注意的是,金属坯体采用篆刻技术加工纹饰,并未使用锤揲、冲压等金器专属工艺,而是依托青铜技术完成。这表明,战国至西汉初期的金器制作仍处于从青铜工艺向金器工艺过渡的阶段,反映了当时北方游牧民族在金属加工技术上的创新与融合。付迪介绍:“这些工艺反映出当时匈奴人已经开始向中原地区学习发达的手工业技术,工匠之间也会进行技术交流。”

乌兰察布地处长城以北的农牧过渡带,在历史上是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交往的重要枢纽,也是草原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专家推测,此类金饰可能是通过贸易、赏赐等途径传入草原,印证了当时南北文化交流的广泛性。

如今,虎衔鹰金饰牌静静陈列在乌兰察布市博物馆,它的历史意义、工艺水平及文化价值,仍向世人诉说着两千多年前草原丝绸之路的辉煌。



虎衔鹰金饰牌



讲解员向市民讲解虎衔鹰金饰牌

实习记者 张可心 摄